

漂移丛书

一代新人的诞生



魏云著



云南大学出版社  
YUNNAN UNIVERSITY PRESS

魏云，批评家，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研究人员，云南大学文学院讲师，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。

漂移丛书

一代新人的诞生



魏云 / 著



云南大学出版社  
YUNN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一代新人的诞生 / 魏云著. —昆明: 云南大学出版社, 2017

(漂移丛书)

ISBN 978-7-5482-3093-9

I. ①一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小说评论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07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96641号

---

策划编辑: 徐曼 责任编辑: 宋武 装帧设计: 刘雨

---

漂移丛书

# 一代新人的诞生

魏云 / 著

---

出版发行: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印 装: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: 6

字 数: 97千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2-3093-9

定 价: 30.00元

---

社 址: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 (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)

邮 编: 650091

电 话: (0871) 65033244 650310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up.com>

E-mail: [market@ynup.com](mailto:market@ynup.com)

---

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, 联系电话: 0871-64167045。

---

## 语言漂移说正义（代序）

李 森

“语言漂移说”简称“漂移说”。它认为一切艺术语言均处于漂移状态，在漂移中生成诗意或非诗意，在漂移中寂灭或退隐、凝聚或新生；它认为诗性的创造既不来源于本质，也不来源于现象，而源于语言在漂移时刻的诗意生成。

语言漂移说之语言即艺术语言，它包括艺术中的日常语言、书写语言、视觉语言和符号语言等语言范畴。艺术语言既非形而上，也非形而下，而在形而中。“形而中”是艺术语言的滑翔地带，它摩擦着形而上和形而下穿行，形成自为自在的独立时空。我多年前试图阐明的“形而中诗学”作为一种诗学方法，是漂移说语言运动方法的构成部分。

一切艺术（包括狭义的语言艺术和广义的语言艺术），都在语言漂移说的观照范畴之内。

一切艺术都是语言艺术，除此之外，便无艺术。比如行为艺术，它是一种身体表现的艺术，身体在表现的场域（时空）中形成身体语言。身体语言只有在观照的时刻，才能生发为艺术语言。

一切艺术的可阐释性都包涵在其语言结构中，而不在语言结构之外。存在着脱离艺术语言的阐释，但那是非艺术阐释。非艺术阐释之大行其道，已经使艺术阐释全面沦落。

概念或观念阐释总是脱离艺术语言的阐释而自成系统，这种阐释或是哲学式的，或是社会学、文化学、人类学的，等等。非艺术阐释或是对艺术的过度阐释，或是语言漂移超越了艺术阐释的某种路径而形成的另外一种阐释。

语言运动的能力或张力，为任何阐释提供了可能性。艺术阐释如果有价值，那就必须为它划定一个界限，这个界限即是贴着艺术语言阐释的界限。

语言漂移说划定艺术阐释和非艺术阐释的界限，是为了证明艺术语言存在的不稳定性，不完全为了证明阐释的无效。然而，艺术阐释的无效性，亦是语言漂移的一种结果。

所谓阐释，当是语言漂移的路径，但不是说艺术需要阐释才能成其为艺术。事实上，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犹如一株芬芳出尘的空谷幽兰，它自身的存在已经达到了自足、直观、圆融的境界，它的存在本身无需阐释，因此，它反对阐释。不过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它有无限多的可阐释性。但必须指出，那种种阐释，是开放的艺术语言自身被灵魂摩擦、砥砺而激活的诗意再生，不是概念或观念对艺术之美的反映。

语言漂移说的方法不仅是对艺术阐释的观照，也是对艺术创作的观照。

有效的艺术阐释或生成某种概念或观念，但其阐释路径总是贴着艺术语言，这是无需证明的常识；而无效的艺术阐释则必然形成“概念控”或“观念控”的逻辑系统，以“自圆其说”的冠冕堂皇调子反对常识。

有效的艺术阐释滋生诗意，甚至是无限多的诗意，它是诗意创造的种种形式；而无效的艺术阐释只有一个目的，

那就是通过逻辑归纳和演绎系统获得知识。“自圆其说”的理论知识，多数是强词夺理的“伪知识”。

可靠而有效的艺术创作不表达、分有概念或观念的内涵。其创作过程或与概念和观念发生碰撞，但最终，它总是以一种回归事物、事态原初直观显现的力量，将概念和观念溶解而化生，恰如大海和盐。

从语言漂移说来观照，艺术理论、批评即创作。没有先验的某种理论和批评的出发点，只有具体的语言凝聚和绽放的路径。有效的艺术理论和批评在表达路径中成就自身，它不利用语言的表达或扩张能力奔向某个目标。作为动词的艺术、诗、美只能在语言自我开显的路径中具体地显现，而不可能呈现整体性的目标。艺术语言只有在被利用时才导向整体性的叙述目标。

没有上帝视觉的自体（整体）性的艺术之美，也没有上帝发声式的艺术法则。按照贡布里希的说法，没有大写的艺术（本体的艺术），只有具体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。进一步说，没有语言自在、自为、自我生发、蕴成之外的艺术。

在《色—彩语言诸相的漂移》一文中，我论述了“本在事象”最基本的四个漂移路径。即“直陈其事”的漂移、“修辞幻象”的漂移、“纯粹形式”的漂移和“意识形态”的漂移。这四个漂移路径囊括了所有艺术哲学或诗学理论的阐释路径。也就是说，古往今来的所有文艺理论或批评路径，都无出其外。本质主义—非本质主义、主—客二元结构理论、模仿说、反映论、形式—内容二元结构理论、形式主义、表现主义等等，均包含其中。这些理论先制造概念，再形成观念，然后利用逻辑归纳或演绎构建庞大而

坚硬的系统，将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关进牢笼。这些宏大的理论，都是语言漂移的种种结果，但语言漂移说将它们视为艺术阐释的无效阐释范畴。

我说的“本在事象”，即是艺术语言或它的结构。何以故？“本在事象”如果是非语言的，那么，我们对其一无所知，它们也不可能进入人类言说或表现的诗意世界。这就是说，人的感知或玄想的存在，是一种语言的存在，而不是实体的存在。人是语言的人，能感知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。说白了，人和他们的生活世界，神和他们被创作的世界，自然和它的存在，都是语言的存在。与生命有关的存在，通过语言才能确定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：“语言是存在的家。”除此之外，按照维特根斯坦《逻辑哲学论》第七命题的忠告：“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。”老子的思想亦处于反对说、而又不得不说的两难之间，这当然是早期圣哲对人类的千古忠告。事实上，《理想国》里的柏拉图也处于说与不说的两难之间，但他还是以“假设”的支点和“比喻”的诗性表达方式说了许多，也虚构了所谓“理念”，为人类打制了一副“理性”胯下的马鞍。柏拉图为了做“哲学王”，为了打制这副理性的马鞍，怀着悲智、悲情之心，将诗人——他的灵魂的一半——自己也是个杰出的诗人，赶出理想国。但从他的全部对话录中即可看到，哲学，“本质上”是利用逻辑表达系统而言说的文学。不能洞明这一点，即是逻辑主义的智障患者。

艺术语言的漂移是具体的，而不是抽象的。一个词，一个句子，一个笔触，一点笔墨，一根线条，一种音声形色，作为语言运动的“表象”或“形式”，它们总是寂静

地、平实地、迂回地或疯狂地处于某一个作品结构的“位点”上。而所有“位点”，都是“暂住”的位点，即漂移的位点——既不是“本质”的位点，亦不是“非本质”的位点，而是“暂住”的位点。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语言漂移说，既非本质主义的，亦不是非本质主义的。因此，语言漂移说反对一切凝固的、教条的、逻辑主义的或任何主义的语言强暴。

一切艺术语言之为艺术语言的确立，都源于人的感觉、感知能力，然后，将其蕴成文字、旋律、节奏、形色或符号。用佛哲学（非佛教哲学）的看法，即源于“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”这“六根”，通过此“六根”的感觉、感知发端，风春万物般与“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”这“六尘”的“情识”摩擦、蕴育而生发。有效表达的、蕴有纯粹诗意的艺术语言，是一种符号化暂住的、鲜活流荡的“蕴”，即一种自成意味的生命序列。它看似是系统性的，但“实质上”是碎片式的。朵朵桃花看似是一个整体，其实是蓬松一树那相似形一色、彼此陌生的碎片序列。当然，可以假设它是一个整体性序列，并与时序和空间相联系而蕴成之美，但仅仅是感觉、感知的一种假设性的观照。艺术语言的存在序列，犹如一树桃花，见与不见，开与不开，美与不美，都在观照的“此时”那个“位点”上“暂住”而被看见，被描绘。艺术语言的色—彩、笔—墨、笔—触、形—式，永远不能抵达那一树实体的、实相的桃花，因为语言艺术中隐秘的一树桃花，既非具体的一树桃花，也非本质（实相）的桃花。这是语言自身的决定，人或神都不能做此决定。

艺术语言的“暂住”，是语言漂移的“暂住”。是故，

“暂住”其实是诗意的“无所住而住”。《金刚经》说：“不应住色生心。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”说的是，有“缘起”，则“暂住”，无“缘起”，则“无所住”。在语言漂移中的“暂住”，即是“生其心”，生诗意之心。

每一个语词、每一个单纯的符号，都是一个小小的宇宙，一个处于寂灭或生发碰撞时刻的生命之蕴。

我们不能利用艺术语言，我们只能激活它，或拯救它。救救我们的语词吧，因为，它们是我们精神生命、现实生命的细胞。

诗意的语言存在，是心灵结构漂移幻化的某种样式；推而广之，可以观照的心灵结构存在的样式，亦是语言漂移迁流存在的样式。至于那些格式化心灵结构的存在样式，则是语言漂移迁流过程中自我固化的种种死亡格式。

从自我拯救语词开始，自我疗救审美智障，即是审美心灵、诗意心灵的自救。

语言漂移说的提出，是要告别所有诗学理论的。但这不是说，要以一种理论的雄心替代或征服另外的理论——那也是逻辑主义的神经病。如果人们有此看法，那是对此说的误解。因为，语言漂移说“本质上”并不是一种理论，而是一种开放的、处于语言运动自我生成诗意时刻的审美方法，一种素朴纯真的人性观照思—想，一种自我拯救语言—心灵的行动。在它为人之为人的审美自由开掘路径的同时，它就是某种随时处于被激活状态的审美自由。

2017. 10. 6 燕 庐

## 目 录

- 001 一、一杯人生的苦酒：重读《平凡的世界》
- 020 二、一代新人的诞生：从《兄弟》到《1988 我想和世界谈谈》
- 041 三、中国好人：关于余华的《第七天》
- 064 四、一首顾影自怜的诗：《春尽江南》与新世纪
- 084 五、革命的奇幻时光：王小波与卡尔维诺
- 107 六、化蛹为蝶：《未央歌》与《野葫芦引》之昆明
- 128 七、一个环保主义者的乡愁与怀旧
- 145 八、萨冈：迷恋激情
- 158 九、赫拉巴尔：小酒馆里的老子

## 一、一杯人生的苦酒： 重读《平凡的世界》

在“新时期”小说中，《平凡的世界》平淡无奇，但影响甚大。它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一个经受苦难的人生故事，意在呼应时代、锻造史诗，至今仍被不少读者看作一部“杰作”。尤其是，当故弄玄虚、空洞自恋之作耗尽了读者的耐心时，路遥笔下那照相式的饥饿与贫乏，以求生的本能意志渲染出一幅乡村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图卷，以其特殊的方式慰藉了人心。因“无愧于时代”的使命感，它并未沾染一星半点的“虚无”，与此前那个“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”的世界浑然一体。

苦难的泪水、道德的偶像，汇聚为一股时代急需的“良知”，让这部思想驳杂的小说赢得了阵阵喝彩。1998年，央视评选“到现在为止对被采访者影响最大的书”（1978—1998），它名列第六，为“新时期”小说唯一入选之作；同年，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”显示，它是读者最喜欢的作

品；当代“打工仔”手中常见的畅销书，乃是它的盗版（邵燕君：《倾斜的文学场：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60-166页）。今日新版之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被赫然冠以“‘茅盾文学奖’皇冠上的明珠”——“当代经典”之名，呼之欲出。

然而，改革开放毕竟已经三十多年了。三十多年后回顾，《平凡的世界》实在是一部力不从心的“改革史诗”。

作家认同现实主义，喜好直白的文字。这种质朴的文字，确实毫不费力就探入了混沌的乡野世界。也正是这种能力，让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的乡村，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，让作品有了厚实的底座：老实人孙玉厚的弟弟玉亭，根正苗红但好吃懒做，当不了工人回了村，竟官任大队支委，老婆乃村中妇女主任。这家“穷先进”饿着肚子讲革命道理，日子稀烂而豪情不减，仿佛消灭了生理需求。但一转眼，“革命家”也善于揩油：此公到支委金俊山家，金家老婆泡了茶——平时饥肠辘辘，他绝不敢喝茶——这天凑巧在“大会战”的大灶上吃过碗肥肉，于是端茶就喝。讨论半天，两位支委决定批斗一个傻子，以求“政治过关”，

让“革命”顿失真诚。乡村的闹剧一幕接一幕，令腥臊的丑闻浮出了水面：天灾大旱，支书带人扒了别村的水坝。金家兄弟贪心，不听指挥，导致坝垮了，大水冲走了在下游大便的金俊斌。俊斌就这样成了“烈士”，而他老婆——那风骚寡妇很快就与玉亭有了苟且。金家前来捉奸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械斗。主人公孙少平的这位叔父孙玉亭，不过一介丑角，但只要触及乡村生活的冰山一角，意识形态空洞口号无法约束的野性，立刻就弥漫四处、难以收拾。

但一部事关“改革大业”的史诗，不能就这样消散在乡野懵懂粗俗的野生状态中，沦为一种“自然主义”。于是，作家渴望找到那条隐现于纷繁现实之下的时代“红线”，但并未如愿。显然，与《人生》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，《平凡的世界》表现人性的紧要之地仍是乡村才子的青春与爱情；但爱情囿于“小我”，不足以凸显“改革”这本大戏。因此，上至省委书记，下至村社干部，作家苦心描画出一连串的人物，最后在历史的迷雾中还是不了了之。大小领导在改革中的进退，多少显得机械，一旦真涉及“改革大计”，往往呆板无趣：毕竟，少平不足以窥见改革大局；田福军又过于显贵，

其宦海沉浮，难以激发普通读者的情感共鸣。尽管作家希望不偏不倚，但作品的重心，还是落在了年轻的主人公身上，让“改革的史诗”向着“青春的幻想”不断倾斜。

改革既是一场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探索，航向自然不为普通人所知；但作家既要“呼应时代”，又不便摇身一变成为“预言家”，所以只好保持一种素朴之心，深信一切改革之美好正当，毋庸置疑——前提是，“改革派”人物须牢牢掌权。至于改什么、怎么改，作家不明就里，也不便深究。因此，这部意在描写“改革”的作品，起于饥饿年代的爱情，终结于“官场小说”式的人事纠葛，就显得毫不足奇了。对历史须有个交代，于是——在正气伸张的祥和氛围中，改革之新生力量既已渐入佳境，精疲力竭的作家也就趁机落下了“改革”的大幕，偃旗息鼓，让历史沿着隐秘的轨道自由运动去了。

一部作品敏感于个人的体验，而暗昧于时代的去向，限于作家政治的视野，这一点并不意外，也不该苛求。但在所谓“时代精神”之外，描写“有深度的人物”乃现实主义作家的本职，生产队长孙少安等“呼应时代”的主角却令人十分失望。

读者不难发现，《平凡的世界》之“改革”，像一部生吞活剥的《创业史》。少安力图带领农民走上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的康庄大道，太像梁生宝带领乡亲们走上“合作化”之路，相较之下顿显呆滞。让少安喜滋滋、甜蜜蜜的“创业史”，不久前还是翻身农民应当唾弃的丑恶“发家史”——尽管农民笃信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的投机哲学，但作家本人对这历史辩证法的“正一反一合”三阶段，竟无力做哪怕一丁点儿的思辨，虽情有可原，却颇显肤浅——历史方向的“剧变”，没有引起一丝困惑；作家未及深思，就手忙脚乱地为致富了的人物戴上了一顶金钱的桂冠。此外，因不敢越“人民群众创造历史”之雷池，作家以所谓“群众史观”书写改革开放，实际上变相贬低了总设计师和其他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，让改革成了一架自鸣钟。就这样，改革开放成了一部“没有英雄的史诗”。

真可谓老马识途：习于“图解政策”的写作惯性，一旦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，就立刻滑进旧习惯之轻车熟路。今日读来，《平凡的世界》之描写斗争，也与《创业史》如出一辙，令人“雌雄莫辨”：“路线斗争”依旧，只不过换一拨人物与口

号而已。改革开放何以能够推动大乱后的中国走上稳健的发展轨道，让人民发家致富，作家一笔带过，只急于为改革树碑立传——锣鼓喧天，反显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油滑世故，把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大事件，弄得如许轻飘恍惚。

失去了时代发展的“红线”，作家就在改革的闹市迷了路，孙少安、孙少平兄弟所见所闻，真有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感受。确非先知先觉，作家偏偏绘出了一幅城市建设“发财记”的草图。改革伊始，让全国变成“大工地”的基建，正是无数暴发户的沃土，也是许多“社会不公”合理化的起点。在《平凡的世界》里，我们就已看见：包工头有人撑腰，肆无忌惮；小工只顾眼前，迟钝麻木；年纪尚幼的女工受辱而又渐渐堕落。一切日后所谓“打工文学”的主题，尽在彀中。改革之初，《平凡的世界》所描写的细节，已多少令我们想起雨果《悲惨世界》扉页上的题词：“只要这样三种现象依然存在，那么，类似本书的作品就不会没有意义：贫穷使男子潦倒，黑暗使儿童羸弱，饥饿使妇女堕落。”

显然，作家并未想得太多。办起了砖厂的少安，成了第一代“农民企业家”：“贴身一套红线